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纪念陈寅恪先生 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

编 委:

季羨林 周一良 邓广铭

王永兴 荣新江 (执行编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

责任编辑：刘 方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2.75 印张 500 千字

1989 年 12 月第一版 198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1,100 册

ISBN7-301-00841-4 / Z · 013 (平)

定价: 7.90 元



陈寅恪先生

(摄于中山大学东南区 1 号楼上阳台, 约在 1957—1959 年间)

序

近几年来,寅恪先生的弟子们和弟子的弟子们,以及其他一些朋友,经常谈论一件事,想在先生诞辰百周年时,出一本论文集,以资纪念。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邓广铭教授对此事异常关注。中心成员王永兴教授和荣新江副教授实主其事。惨淡经营,几经周折,终于把稿子集成。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当前出版界碰到极大的困难时,不顾经济损失,毅然承担出版责任。我们中国史学界的同仁们对上述诸位学者和出版社,决不会吝惜自己由衷的赞美和敬佩。

用论文集的形式纪念某一位有造诣有影响的学者,是在东西一些国家中一种流行的办法,在日本尤为普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还历纪念”、“古稀纪念”一类字样的纪念论文集。纪念对象大都仍然健在。这种办法在中国比较罕见。但是解放前中央研究院纪念蔡元培先生的论文集,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现在为什么用这种形式来纪念寅恪先生呢?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决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怎样才能算是一代大师呢?据我个人的看法,一代大师必须能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一世之新风,踵事增华,独辟蹊径。如果只是拾人牙慧,墨守成规,决不能成为大师的。综观寅恪先生一生治学道路,正符合上述条件。他一生涉猎范围极广,但又有中心,有重点。从西北史地、蒙藏绝学、佛学义理、天竺影响,进而专心治六朝隋唐历史,晚年又从事明清之际思想界之研究。从表面上看起来,变化莫测;但是中心精神则始终如一。他号召学者们要“预流”,也就是王静安先生和他自己所说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学问”,学者能跟上时代,就算是“预流”。寅恪先生在上述各个方面都能“预流”,这一点必须着重指出。他喜欢用的一句话是发前人未发之覆。在他的文章中,不管多长多短,他都能发前人未发之覆。没有新义的文章,他是从来不写的。他有时立一新义,骤视之有如石破天惊,但细按之则又入情入理,令人不禁叫绝。寅恪先生从来不以僻书来吓人。他引的书都是最习见的,他却能在最习见中,在一般人习而不察中,提出新解,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

寅恪先生继承了清代朴学考证的传统,但并没有为考证所囿。考证学者往往不谈义理,换一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不大喜欢探索规律。但是,寅恪先生却最注意探索规律,并不就事论事。他关于隋唐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证。他间或也发一些推崇宋学的议论,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今世论者往往鄙薄考证之学。实际上,研究历史首先要弄清史实,考证不过是弄清史实的手段,既不必夸大其辞,加以推崇;也不必大张挞伐,意在贬低。我们历史学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高唱“以论带史”,却往往是“以论代史”,其甚者甚至置史实于不顾,而空谈教条,这样的教训还少吗?提倡一点考证,可以济我们历史研究之穷,不是一件坏事。寅恪先生利用考证达到弄清史实的目的,一直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STUDIE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CHEN YIN-QUE

Compiled by
Center for Study of Chinese Medieval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Members of Editorial Committee:

Ji Xian-lin Zhou Yi-liang

Deng Guang-ming Wang Yong-xing

Rong Xin-jia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9

目 录

序	季羨林	1
陈寅恪先生传	蒋天枢	1
师门往事杂录	蒋天枢	10
怀念陈寅恪先生	冯友兰	18
陈寅恪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论”	周勋初	20
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	石 泉 李 涵	32
重读《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卞慧新	35
南北朝时期南北儒学风尚不同的渊源	何兹全	45
谈六祖出生地(新州)及其传法偈	饶宗颐	49
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	邓广铭	53
鄂君启节考释(八篇)	朱德熙 李家浩	61
新博本吐火罗文 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第 1.42 张译释	季羨林	71
杜正伦《文笔要诀》校笺	王利器	75
说宛	周一良	95
解开千年之谜《短歌行·对酒当歌》	万绳楠	98
《李太白集》的几个主要版本	詹 锜	108
《长恨歌传》笺证	周绍良	123
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从杜甫到李商隐、韩偓	程千帆 张宏生	153
论元好问词——《灵谿词说》续集之一	缪 钺	166
孙坚军事力量的形成壮大及其争夺荆豫两州的战争	方诗铭	180
试论孙吴政权的地域性	胡守为	187
关于《华阳国志》版本的几个问题	顾廷龙 于为刚	194
北府兵始末	田余庆	199
都督中外诸军事及其性质、作用	祝总斌	221
唐代狱讼制度考析	刘俊文	242
关于唐代后期方镇官制新史料考释	王永兴	267

陈寅恪先生传

蒋 天 枢

陈寅恪先生，江西修水人。生于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旧历五月十七日乙酉。时寓居湖南长沙周氏蛻园，唐诗人刘蛻故宅地也。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先生生值寅年，为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行字)。父三立，字伯严，号散原。光绪十二年进士，授吏部主事。以侍父告归。有散原诗集、散原文集。母俞明诗，山阴俞明震恪士之妹。能诗而擅鼓琴。有《神雪馆诗集》(未刊)。先生生时，值祖父宝箴赋闲侨居。其年秋，始授湖北按察使。昔年枢曾以字请，先生语之曰：“忆闻余初生时，适九十老人熊鹤村来，先祖拟以鹤寿字余，然此字未曾使用”。又闻老友吕贞白云：闻诸彦通，先生字规庵。然未闻先生言及。生平以名行。修水县旧名义宁州，学者或称义宁先生。

第一章 求学时代

昔年尝闻：先生幼年居湘时，家人为聘湘人周姓者为塾师，授先生兄弟读。考先生祖父宝箴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授湖南巡抚，时先生六岁。兄隆恪《长沙将见六弟于抚署》诗自注：“旧抚署东西院内各植桂树一株，大可合抱，童时常与诸弟嬉游其下。”诗在民国五年，疑先生入塾受书时全家已移住抚署内。唯所谓周姓塾师不详何名。后读先生兄师曾《蜗牛舍诗集序》中云：“吾师周印昆先生论吾父诗为有清诗人之殿，亦旧诗之殿。”此周印昆殆即居湘时塾师。杭州叶卷龢藏书目录载《夕红楼诗集》八卷、《夕红楼诗续集》三卷，注云“湘潭周大烈，字印昆”。则周姓塾师为周大烈。光绪二十四年八月，祖父宝箴罢免湖南巡抚，家属当即离湘返南昌。时先生九岁，则在私塾当甚短暂。后来周印昆移家北京，兄师曾与周时有往还。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先生十三岁，随兄衡恪东渡日本留学。嗣以假期归，又与兄隆恪同考取官费留日。十七岁时以病回国疗养，次年插班考入吴淞复旦公学。宣统元年(1909)夏，复旦公学毕业(时复旦公学相当高中程度，后迁校江湾，始办大学)。时年二十岁。秋，由亲友资助赴德，考入柏林大学。1911年秋，入瑞士苏黎世大学。1912年(民国元年)旧历春，以资用不给，由瑞士暂时归国。曾晋谒父执夏曾佑。次年春赴法，就读巴黎大学。1914年(民国三年甲寅。阳历八月，欧洲大战起。)春，仍在巴黎大学，江西省教育司(即厅)司长符九铭电召回江西南昌，阅留德学生考卷。并许补江西省留学官费。1915年(民国四年乙卯)春，至京，曾短期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秘书。时袁世凯方筹谋称帝，先生《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文云：“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1916年(民国五年丙辰)阳历八月，总统黎元洪特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督军。谭为散原老人旧交，以故，延聘先生至湘，任职湖南交涉使署。清华大学部第三级同学卞僧慧《怀念陈寅恪先生》文(未发

表)云:

往者先生讲史,言档案之用,尝谓:曾在湖南交涉使署工作。初至时,终日披阅档册。

对外交涉,不能仅凭条文,自逞臆断。必熟于案例,事来方能举措得体,不致貽笑或僨事。

先生于民国五年至长沙就交涉使署事后,疑中间未尝离去,故有“丁巳秋客长沙寄寓寿星街雅礼学会即文慎公旧第”语也。

按下文所言,甚是。(后引简称“卞记”)。疑交涉使署即附设旧抚署内,而雅礼学会则先生住处也。

先生自民国四年寓京,继又至湘,此期间先生有《琐窗寒》、《破阵子》、《浣溪纱》词三阙,载早年《东方杂志》(十三卷第十一号文苑栏,民国五年十一月发行,后又转载民国廿五年出版之《词学季刊》三卷二号。两刊相较,可正误字。)。传世诗文仅此三首词而已。从词意约略可见在京、在湘时意绪:有“莫把寻常花月恨,谱入钿箏旧雁弦,春城话可怜。……冷落闭门逐锈鞞,东风伴醉眠。”及“来住江城惆怅客,泪痕和墨教题诗,洞房空想碧螺唇”之句。前年江西教育厅虽有给予官费之说,究于何时实现,未详。而三年积资,恐亦不丰。1917年(民国六年)冬,经由上海赴美,入哈佛大学。学梵文、希腊文等。在哈佛识涇阳吴雨僧,遂为挚友。后又继续在哈佛学习梵文、巴利文二年。1921年(民国十年),先生三十二岁。秋,离美再度赴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民十二年癸亥迄次年甲子(1923、1924年),仍在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等。时国内时局动荡,江西教育厅官费,时停寄,此数年间在德生活至为艰苦。当是时,毛子水、傅孟真、俞大维等均在柏林。毛谓:“陈寅恪及俞大维是他在学问上最心服的朋友。1923年(民十二),赵元任先生拟辞去美国哈佛大学教职回国,须觅一哈佛出身者代替,函先生征求同意,复书云,‘我对美国一无所恋,只想吃波士顿醉香楼的龙虾。’这当然是不要来的开玩笑说话”。(见杨步伟著《杂记赵家》)这年下半年,赵夫妇亦到德,《杂记赵家》说:“到了柏林,值战后德国马克正低,书呆子们大买各种书籍,并还流传着好玩的批评,说陈寅恪和傅斯年是宁国府门前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又说:“有一天俞大维和寅恪请我们看德国歌剧,他们两人送到剧园门口就要走,我问你们不看吗?大维笑笑,寅恪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要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我们心里又感激又难过地领他们这回情”。(这时赵夫妇经济宽裕,在德过了四十天,除上述几人外,还见到童贯贤、何思源、罗志希、张幼仪、徐志摩等。)由这些轶事,可见先生当时在德生活概况。昔年先生尝语枢:在德时曾读德文版马克思《资本论》。此殆后来《经史》诗之所由作欤?

癸亥年(民国十二年)夏秋间,先生母俞暨长兄师曾相继逝世,家中以经济窘困,未告知。以故,先生民国十二年在德《与妹书》尚有“请大哥和五哥在北京收购满蒙回藏文书”语。《与妹书》(全文载1923年《学衡》二十期)现节录如下: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价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西藏文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英、俄、德、法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

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据卞僧慧云:吴雨僧介先生至清华任教时,曾举此文例其他著作。)

由上所录文,足见先生归国前思想梗概及治学方向。以上是寅恪先生求学时代的概况。

第二章 在清华园与南迁北返

民国十四年(1925)。北京清华学校(清华系外交部以美退还庚款创立,创办于宣统元年,即一九〇九年,特赐清华园建校,故校名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字仲述)创议,经外交部批准:停办留美预备部,创办国学研究院,并大学部。于本年开始在全国招收第一届新生。研究院旨趣,取法于吾国书院,并仿英国牛津导师制。其初经多方筹商,聘请王静安、梁任公、赵元任、及寅恪先生为教授(学生毕业证书上所列教师名衔均称导师)。先生以经济拮据,预支清华薪金,始克由德返国(戴幼和述师言)。归后,以父病暨母兄葬事请假一年,明年秋始到清华任教。到校后,初住工字厅,与王静安先生识趣特契,时来与先生话旧事,后来挽词中所谓“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者是也。及王、梁两先生相继逝世,惟寅恪先生巍然为清华泰斗。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先生三十九岁,秋七月十七日与师母唐筼(字晓莹)在沪结婚。时散原老人寓沪。婚后,以开学在近,只身返清华。先生性幽默,一日,同学多人在师家,师云:我有个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大家哄堂大笑。次年,研究院同学为静安先生树立纪念碑于校园工字厅东偏,乞先生为“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抒发思想自由之义谛。今碑已被毁,手边仅存拓片裱本而已!庚午(1930)秋,先生有《阅报戏作》三首,其一云:“弦箭文章苦未休。权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早年潘伯欣北京打油诗,有“欲将东亚变西欧,到处闻人说自由”之句),最是文人不自由”。本年夏,国民党教育部易原清华学校校名为清华大学,并改隶教育部,清华自易名后,先生任中文、历史、哲学系合聘教授。并为中文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开专题课,如“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是时先生授课之余,精研群籍,史、集部外,并及佛典。早年居金陵,与支那内学院邻近,已泛涉佛典,至是更进而为译本佛经之研究,并以高丽藏本校梁慧皎《高僧传》,眉间细字密行,间注梵文巴利文,盖欲为之笺证而未成也。先生在读《高僧传》时,别有论译经传播事业者:“据《高僧传》前三卷,译经门正传及附见者凡六十三人,而号为天竺人者仅十六人。而此十六人中如摄摩腾、竺法兰、鸠摩罗什等,或本人之存在不无可疑,或虽源出天竺而居月支,或竟为龟兹人者尚有数人。然则自汉明迄梁武四百五十年间,译经诸大德,天竺人居四分之一,其余皆罽宾、西域及凉州之人,据此可知六朝文化与中亚关系之深矣”。又云:“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发挥其特性而为本土

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研究本原首在通达其言语,中亚语言与天竺同源,虽方言小异而大致可解,如近世意语之于拉丁。按《出三藏记集》卷八僧叡小品经序谓‘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盖古译音中如弥勒、沙弥之类,皆中亚语,今日方知。足证当时实此类之经本。然其所译,仍大抵是梵文,犹天主教人赍译诸书实皆拉丁之本,而音译名字犹存法、意土音也。由此可知中亚人能直接通习梵文,故能直接研究天竺之学术本源,此则间接之害虽有亦不甚深也。至其利,则中亚大、小乘俱盛,大乘盛于和阗。如朱士行在于阗,为彼地小乘所嫉,然实于其地得放光般若梵本,又经于阗僧无罗叉等之翻译。至东晋法显《佛国记》云:‘于阗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也’。则于阗必已盛弘大乘。今所掘发区域,于阗近旁多大乘经典;而天山北路,小乘夙盛。卑摩罗叉,十诵大师,先在龟兹,弘阐律藏。玄奘《西域记》:‘屈支诸国皆说一切有部’。今德人发掘库车诸地,所得有部律本甚多。可证六代李唐小乘之学行于天山北路,旧籍所记良不诬也”。于此可征先生以多方面史料证发旧籍之功。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1932)夏,中文系代理系主任刘文典请先生命题招生试题: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外加对对子:一年级为“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二三年级、转学生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以此招致纷纷非议。先生既在《清华暑期周刊》第六期发表《答记者问》,又撰《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详释其义。本年一月,日寇侵占上海闸北,继又成立伪满洲国,国难开始。三月十三日,先生假吴雨僧工字厅住室与同学谈话,谓:“国难会议”列吾名,不拟参加。今日当对日绝交,以便用政府之力为经济断交,方可见效。又,本年开《晋至唐文化史》课,讲晋至唐这一历史时期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环境之关系。谓精神生活包括思想、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等;物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在讲论中,不轻易讲因果关系,而着重条件。并谓: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失之滞。旧派所作中国文化史,其材料采自廿二史中儒林文苑等传及诸志,以及《文献通考》、《玉海》等类书。类书乃供科举对策搜集材料之用,作史没有必要全行采入。这类文化史不过抄抄而已。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新派失之诬。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而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结论如果正确,对于我们的材料,也有适用之处。因为人类活动本有其共同之处。所以,“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过也有时不适用,因为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所以讲“大概似乎对”,讲到精细处则不够准确。而讲历史重在准确,不嫌琐细。本课程的学习方法,就是要看原书,要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经过认真细致、实事求是地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以上录“卞记”)从这些记录,可看出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教学方法。

民国二十二年(1933),先生四十四岁。本年,有《复钱稻孙书》,内容为答复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询问有关中亚史问题。陈哲三《陈寅恪轶事》文中述蓝孟博语云:“民国二十二年我在日本,有天在东洋文库吃饭,饭后大家闲谈,白鸟说:‘蓝君你认不认得陈教授?’我答:‘是不是陈援庵?’他说:‘不是,是陈寅恪先生’。我说:‘那是恩师。’白鸟一听,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白鸟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如何对陈先生如此尊敬呢?他说了,他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覆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覆信说应请教陈教授,当时

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请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不识当日钱将此信原封给与白鸟库吉，还是使白鸟录副而自将原信留起？如能获得原手迹，将可存寅恪先生一段重要文献。

乙亥(1935)春，陈垣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刊成，先生为之序，言：“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微以来未之有也。今复取前所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刻木印行，命寅恪序之。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故承命不辞。欲藉是略言清代史学不振之由，以质正于先生及当世之学者”。陈著体大思精，足挽狂澜。而先生之序亦足发其凡也。

1936年二月十日，在“晋南北朝史”课堂上，同学中有以2月3日《北平晨报》上所刊张尔田《与吴雨生论陈君寅恪〈李德裕归葬辨证〉书》为问者。先生为剖析如次：“孟劬先生(张尔田)为义山专家，然其为此说殊属勉强，实难成立。今不拟答辩，免得使张先生生气。而且与本文论证文饶归葬主旨关系不大。”

先生自述所用的考证方法，先确定“时”与“地”，然后核以人事。合则是，否则非。先生谓“时”与“地”之交叉点，犹如解析几何之Cartesian point(笛卡尔直角坐标系OXY下的坐标，简称“直角坐标”)。义山峡中诸诗，如《汉南书事》、《荆门西下》、《无题》、《风》、《摇落》诸作，反映他在四川、湖北间有一度往返，所谓“巴蜀游踪”。自乾隆以来就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些诗作于大中二年。孟劬先生亦持此说，谓“巴蜀之游，冯浩氏参考诗意，定为是年，说最精确。”不过又别出一说，谓此巴蜀之游，当是有求于杜棕，行至巴西而中悔，认为杜棕不足托，遂不见而还。依此说则行程应先上峡而后下峡。然所引之诗乃为先下峡而后上峡，时地不合，情事也不合。

先生从洛阳出土墓志，知李德裕归葬洛阳在大中六年。并谓以上诸诗即作于是年。义山于大中六年夏间奉东川节度使柳仲郢之命迎送杜棕，并乘便至江陵代祭李德裕归柩，然后于秋间返回东川。以此立说，则各诗皆通，不致如冯张之滞碍难解。

《荆门西下》云：“一夕南风一叶危，荆门回望夏云时”，言下水在夏季。

《风》云：“回拂来鸿急，斜催别燕高。《礼记·月令》：“仲秋之月，盲风至，鸿雁来，去鸟归。”……楚色分西塞，夷音接下牢。”是上水在仲秋。又云“归舟天外有”，如找杜棕谋事，不应称“归舟”。《汉南书事》云：“西师万众几时回，哀痛天书近已裁。……”此诗冯浩编在大中二年，而注中引大中四、五年事。唐宣宗对党项锐意用兵，大中四年犹贬孔温裕。以后知不成，始悔祸。大中五年赦党项，故六年作诗可称“哀痛天书近已裁”，若在大中二年，义山何能预知五年事！及六年党项再入寇，乃用毕诚为邠宁节度使，招谕党项。

《摇落》云：“结爱曾伤晚”。义山娶王茂元女时不过二十几岁，不应言“伤晚”。大中二年未闻其妻死。若至六年，则王氏已卒，义山已四十岁，此时谓妻谓妾，均可说通。是日先生所解说，大致如此。（“卞记”）

丁丑(1937)，先生四十八岁。阳历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七月二十八日，京郊有激烈战事，当夜二十九军撤退。八月八日正午日军入城。津沽旋亦沦陷。时散原老人在京就养，难作，因发愤不食五日死。先生在“文革”中交代稿所言“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八十五岁的老父亲因见大局如此，忧愤不食而死”者是也。先生与兄隆恪、弟方恪、登恪等料理父亲丧事毕，于满“七七”后，离京转津南行，以其时清华议迁长沙故也。沿途备历艰辛，于十一月下旬始抵长

沙。未几,由于时局变化,清华大学临时校址又决定迁云南。于是先生携家再南下,经香港转滇。抵港后,师母因沿途劳顿过度,心脏病发,留港。时许地山任香港大学教授,代为租赁房屋,安顿师母及流求、小彭、美廷。先生则于翌年(1938)春节后,只身经滇越铁路去云南蒙自,到蒙自后即感染疟疾。未几,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先生在蒙自授课仅数月,学校又归并为“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当时虽云并校,而三校仍各有办事处,各有研究院(据当日研究生程绥楚言)。先生乃于己卯(1939)春,再由蒙自移居昆明。寓靛花巷青园学舍。系中研院所租楼房,劳幹、郑天挺、邓广铭等均寓其处,得以朝夕晤谈。时家属仍寓香港,以货币贬值,薪资寄到香港换成港币后很难维持生活,兼以师母病重住进医院,虽经顽强地战胜疾病,出院时刚能起床。更以经济困难,不得不寻觅租金低廉住处,以故在港四年,搬家六次(均流求笔记)。由上具见先生离京后生活之艰辛与窘困也。

己卯(民国二十八年、1939)春,先生五十一岁,仍在西南联大,授《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并为研究生开《白居易》。旋于是年春季,受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之聘,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程绥楚用“今圣叹”笔名著文云:“先生在战时应牛津之特聘,主讲东方汉学,全欧汉学家云集于奥格司佛城,女史学家陈衡哲评之曰:‘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司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此余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办事处后住宅中,亲闻于衡哲女士者”。暑假后离昆明赴香港,拟全家搭轮去英伦。抵港后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滞留香港。秋九月,重返昆明。《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诗有“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之句。次年三月,由昆明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庚辰暮春重庆夜归作》诗有“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之句,吴雨僧释云:“某巨公宴请到会诸先生,寅恪初见某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先生对世务之观感有如是。时物价涌涨,生活艰苦,诗有“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句,纪实也。师母仍卧病香港,先生暑假后再至港,待机赴英,既不能成行,就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辛巳(1941),先生五十二岁。是年春,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稿本序文末署“辛巳元旦陈寅恪书于九龙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号寓庐”。(此书手稿本,近已付影印)本年八月四日,许地山卒于港大,先生深为悼念。是年旧历十月二十日,太平洋事变作,日本人占领香港,先生离香港大学闲居。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先生赴英伦事或终能成行,虽已发现眼疾,倘得良医治疗,将不致终于失明。际遇之颠连如此!先生虽处如是之困境,仍于十月末校读完《新唐书》第二过。继又购得商务本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十二册,于本年“岁不尽四日”(见跋文)读完。先生治学之勤勉又如此!次年(壬午),仍困居香港。正月至春末,再校读《新唐书》第三遍。直至五月五日,始由香港取道广州湾返内地,六月末抵桂林,在桂林留一年余,“广西大学送来与中英庚款会约定之聘书”(见与傅孟真书),遂暂留任教于广西大学。有《夜读简斋自湘入桂诗感赋》诗,有:“只谓潭州烧小劫,岂知杨獠舞多姿(自注:简斋诗:杨獠舞吾侧。)还家梦破恹恹病,去国魂销故故迟”之句,足见自伤身世之哀感。癸未(1943)秋八月,由桂林启程北行,于十一月抵重庆,因病少留。继即转赴成都,以全家患病,于旧年年底始达。任教于燕京大学。次年有《病榻作时目疾颇剧离香港又三年矣》诗,中云:“携家未知家何置,归国唯欣国尚存。四海兵戈迷病眼,九年忧患蚀精魂。”足见离京南行后生活,感慨万千。

乙酉(1945),先生五十六岁。正月,因生活艰苦,营养很差,左眼视网膜剥离加重,终致失明。虽经医生施手术,未奏效,并因手术时把视网膜搞皱,致后来无法再弄平。(本年八月十日,

日本投降)是年秋,英国牛津大学约先生赴伦敦疗治目疾。希能痊愈,仍留牛津讲学。于是由成都搭机去昆明,再经印度乘水上飞机去伦敦。抵英后,由于第二次大战方结束,国外生活亦不好,营养较差,虽经用电针贴合视网膜,由于网膜皱在一起,无法复原。明年春离英归国,绕道美国,阳历四月,达纽约。原拟再试医疗,后闻美国名医亦无良策,遂决定不登岸。仅得与旧友赵元任夫妇及留美学生周一良、杨联陞等晤叙。时为丙戌三月十八日,1946年4月19日也。

先生自丙戌十月经南京转沪乘轮返清华后,明年丁亥春,修改前在成都所草《元白诗笺证稿》,助先生工作者为研究生陈庆华、王永兴等。时事日非,眼又不见,名书斋曰“不见为净之室”。时钱稻孙在日本,函请物色元稹《长庆集》善本,未得,别为购日本影印《法显传》寄来(见钱明信片)。冬,寒甚,清华因经费绌,无力供暖气,需住户自理,先生生活窘困,不能生炉火,将所藏巴利文大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用以购煤,闻仅以一室装火炉而已。此后两年间,虽备历艰苦,仍继续讲学及著述。有《丁亥除夕作》,诗云:“杀人盈野复盈城,谁挽天河洗甲兵。至德收京回纥马,宣和浮海女真盟。兴亡总入连宵梦,衰废难胜饯岁觥。五十八年流涕尽,可能留命见升平。”诗情哀而意切。未几而升平果至矣。

第三章 南迁岭表

当戊辰年(1948)阳历十月间,北平已面临解放。其时清华附近已闻炮声,先生携家避入城内。师母《回忆录》云:“因清华大学北边一带炮火很密,寅恪携家入城,暂住在师曾大嫂家中。只一二夜,又迁入中研院宿舍。当晚有人来说,明晨有一便机往南京,请陈寅恪先生同搭乘。据说是傅斯年打来的电话。次晨即往南苑机场搭此机离开北京。同机除胡氏夫妇外不识者二十余人。我们在南京只住一晚,即搭夜车往上海。”在沪,接受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聘约,岁杪,全家在沪乘秋瑾号轮去广州。岭大派校船到广州黄浦江口,直接接全家到学校码头。住进西南区五十二号。先生在沪时,值胡适来沪,劝先生同赴台湾,拒之。到广州后,傅斯年屡电催赴台,不往。在岭大兼历史、中文两系教授。1950年冬,《元白诗笺证稿》线装本印成。1952年夏,迁居东南区一号楼上。是秋枢赴粤晋謁,即在此寓。枢之至粤,岭南大学名义尚存,未几而广州有院系调整令,岭南大学名义取消,原中山大学迁入岭南大学校舍,先生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1953年旧历九月,开始撰写《论再生缘》。1954年春,国务院派原在清华任先生助教之汪钱来穗,迎先生赴京,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先生恋广州气候煦和,谢不就,荐陈垣代己。本年春,《论再生缘》初稿完成。开始撰写《柳如是别传》。1955年春节,先生撰联标门口:“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师母以枢能喻旨,亲书一联寄赐。今犹存。)时“反右”将起,有记者谒先生请“鸣放”,先生笑指门上春联示之。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开始,先生受到批判,遂不再教课,专力著述。次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来访,《在大连创作座谈会上讲话》云:“我与陈寅恪谈过话……一九五九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一九五八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

几次。他不大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本年七月有寄赠吴雨僧诗三首,其一云:“葵羹桂醕足风流,春雨初晴转似秋。桑下无情三宿了(吴注:见《后汉书·襄楷传》及东坡别黄州诗),草间有命几时休。早来未负苍生望,老去应逃后死羞。传语朋侪同一笑,海南还胜海西游。”1961年秋,吴雨僧离渝外出访友,先至武汉大学访刘永济,刘《减字木兰花》赠别吴雨僧词序云:“雨僧由渝来汉,小住四日即赴穗。再入都,然后西去”。吴至穗后,与先生晤谈甚欢,赠吴诗有“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洸澜”之句。又有《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诗云:“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是时,所撰《柳如是别传》行将完成,而连年来身体尚健,双目迷朦可辨径道,常由师母陪同在园内散步。并能驱车到市内听京戏。为过岭以来比较安适时期。

1962年,夏六月初十日,右腿骨跌折,住进中山二医院。因年老未动手术。当时枢曾建议请上海中医骨科专家治疗(时王子平、魏指薪最有名。曾亲闻魏言,常到外地给首长疗疾。),先生不肯,致断腿终未能复原。先生生平不信中医,在成都视网膜剥离时,如不动手术,倘获名医,服中药亦可奏效。一时手术之疏,致终身无复明之道,重可伤矣。在中山医院留住半年多,由医院抬回家。陶铸同志给派护士三人,轮班照顾。1964年五月枢赴穗晋谒时,虽能由两护士左右扶持起立,不复能再如往日由师母陪同散步矣。是年夏,《柳如是别传》初稿完成。自草创至是已历十年。全书后有《稿竟说偈》曰:

奇女气销,三百载下。孰发幽光,陈最良也。嗟陈教授,愈教愈哑,丽香群闹,皋比决舍。无事转忙,然脂瞑写。成册万言,如瓶水泻。怒骂嬉笑,亦俚亦雅。非旧非新,童牛角马。刻意伤春,贮泪盈把。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未署:“钱柳逝世三百年,岁次甲辰夏五月陈寅恪书于广州金明馆,时年七十五。”冬十月,复为写定之《论再生缘·校补记》作序云:“此文乃颓龄游戏之笔,疏误可笑。然传播中外,议论纷纭,因而发现新材料有为前所未知者,自应补正。兹辑为一编,附在简末,至于原文,悉仍其旧,不复改易,盖以存著作之初旨也。噫!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点佛弟之额粉,久已先乾。裹王娘之脚条,长则更臭。知我罪我,请俟来世。一九六四年岁次甲辰十一月十八日文盲叟陈寅恪序于广州金明馆”。录上二跋,可见先生此时之情怀,亦足见失明挨足后仍著述不辍之襟度也。

1966年(丙午)6月1日,北京文化大革命开始,6月6日,广州文化大革命开始。运动开始后不久,助手黄萱被红卫兵赶走,不准再协助先生做工作。九月,又将公家所派护士三人赶走,仅自出资供轮班代替之护士一人得留。是后,乏人扶持,折磨日益多。“其初,风声日紧,师母命人将阳台外门关闭,旋有人从阳台上爬进,开了大门,大量人涌进楼上,挤满一屋,大字报贴到床上、门上,先生心脏病开始恶化。自是红卫兵来抄家者先后不绝,谁想抄家,随时可去。”凡是可拿之物,大至落地收音机,小至茶杯,无所不拿。家中用品,遂荡然无存。有一次,为勒索师母家藏珠宝首饰,竟至被打甚重,饰物终被抢去。后来又要抬先生去大礼堂批斗,师母阻止,被推倒在地。结果由前历史系主任刘节(早年学生)代表先生去挨斗。自运动起后,先生被指为特号“反动学术权威”,不但工资冻结,即少量存款亦被冻结。因而有《申请书》:一、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唐筼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工、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申请暂保留这位老工友,协助厨房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一位工友工资廿五元,饭资十五